

主 编 庞守兴 广少奎
副主编 唐爱民 李 允

教育学新论

JIAOYUXUE XINLUN

山东大学出版社

教育学新论

主 编 庞守兴 广少奎
副主编 唐爱民 李 允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育学新论/庞守兴,广少奎主编.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 8
ISBN 978-7-5607-3921-2

- I. 教…
- II. ①庞… ②广…
- III. 教育学 - 文集
- IV. G4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5354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曲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720 × 980 毫米 1/16 20 印张 410 千字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9.5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序

最近几年,中国教育正经历着中国教育史上重大的发展和深刻的变革,义务教育的普及、新课程改革的推进、高考制度不断完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等无不成为时代的缩影。教育所取得的成绩和进展使每个教育工作者感到自豪。

教育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是传递生产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的必要手段,是促进人发展的事业。人,作为劳动力,是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而人的体力和智力的发展,主要靠教育的培养和训练。教育承担着劳动力再生产的任务。劳动力的再生产,从质量和数量上,都取决于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并作用于物质资料的再生产。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生活中作用的日益强大,邓小平更响亮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深言之,作为知识形态的科学技术在没有被劳动者掌握之前,它只能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而只有当它被劳动者所掌握并运用于社会生产实践,才由潜在的形式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这种“转化”仍然要靠教育对人的培养和训练。教育使劳动者掌握现存的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也要靠受过教育的人去实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工具,是科技进步的阶梯,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核心力量。

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通过培养人来实现的,教育更体现着“以人为本”。人有其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的发展规律,在教育过程中必须遵循这些规律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教育学科的本意也在于此。随着时代的进步,教育的目标、方法、内容、途径等都应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完善。同时,随着“以人为本”思想的普及,也随着对人自身研究的不断深入,教育的发展应在此基础上不仅有量的增长,而且更应有质的提升。由此可见,教育应当是一个不断进化和发展的事业,教育学也应当与时俱进。

面对当前教育科学发展现状,我认为以下三点是更应当突出强调的:

第一,树立教育立国思想。学界公认我是“教育属于上层建筑”理论的守护者,甚至因此被视为思想保守的表现。实质上,“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愁”。我守此论的本意有两重:一是教育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要通过经济基础的中介,同生产力发生相互作用。在阶级社会里,教育是为一定的政治经济所决定,并为一定



的政治经济服务,此乃教育的基本规律。古代教育如此,现代教育也如此;资本主义社会如此,社会主义社会也如此,概莫能外。强调教育的被决定和服务地位,并不是说教育不重要,而是说明教育是怎样为社会服务的。二是发展教育必须有全局的眼光,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一接触教育实际就感到问题成堆、困难重重,而对发展教育失去信心。立此论是为了“教育”领导层面重视教育而非像人们想象的把教育当作政治的传声筒。社会的事业毕竟是人在做,人才的培养必须通过教育,因此,教育直接关乎国家的未来,“国将兴必责师而重傅”,教育才是育人之本、立国之基。

第二,重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的教育传统。要认识到中国有许多优良的教育传统,中国文明之所以能绵延数千年不绝,与中国的教育传统密切相关。只要有条件,就要子女读书识字,尤其重视德育的传统值得人们深思。总结历史发展的经验应当成为教育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源泉。

第三,教育学的发展应强调理论建设。目前教育学界对理论建设的重视程度不够,批评教育理论脱离实际的声音不绝于耳。实际上,教育学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很欠缺,理论方面尤甚。众所周知,人们在教育实践中获得关于教育的感性认识只有通过理性加工,按照一定的逻辑进行必要的整理,使之条理化、系统化并成为严整的体系,才能形成理论。而目前教育界实践观相对突出而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形成了“政策—经验”式教育学模式。尽管教育学已经摆脱了政策诠释的尴尬境地,但以新政策代替旧政策、新经验代替旧经验的做法成为习惯。教育中犬儒主义盛行,教育学科的自我矮化与教育理论自身的建设不足紧密相连。

教育学教学是对未来教师进行现代教育理念、教育学知识和教育研究意识传授的基本途径,而教育学教材是教育学课程的主要依托和基石。因此,编写一本好的教育学教材,及时反映当代教育思想、当代教育研究成果,是多年来曲阜师范大学教育学同仁的追求。以庞守兴、广少奎两博士为首,联合曲阜师范大学所有教育学博士及副教授以上人员共襄此举,值得庆贺。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一定会对教育改革产生出实实在在的影响。

陈信琴

2009年6月16日

目 录

第一章 教育与教育学的发展	(1)
第一节 教育的起源	(1)
第二节 教育学的发展	(7)
第三节 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性质和意义	(14)
第二章 教育的基本规律	(22)
第一节 教育与社会发展	(22)
第二节 教育与人的发展	(33)
第三章 教育目的与教育制度	(45)
第一节 教育目的	(45)
第二节 全面发展教育	(52)
第三节 学校教育制度	(56)
第四章 教师与学生	(68)
第一节 教师	(68)
第二节 学生	(80)
第三节 师生关系	(85)
第五章 学校德育(上)	(90)
第一节 德育的概念	(90)
第二节 德育目的	(92)
第三节 德育过程	(103)
第六章 学校德育(下)	(114)
第一节 德育原则、德育途径与方法	(114)
第二节 德育模式	(122)
第三节 当代学校德育改革	(132)
第七章 课程与教学(上)	(138)
第一节 课程概论	(138)



第二节 课程编制	(142)
第三节 课程改革	(155)
第八章 课程与教学(中)	(161)
第一节 教学概论	(161)
第二节 教学过程与教学原则	(164)
第三节 教学方法	(169)
第四节 教学组织形式	(173)
第五节 教学工作的基本环节	(178)
第九章 课程与教学(下)	(187)
第一节 教学策略	(187)
第二节 教学模式	(195)
第三节 教学媒体	(204)
第十章 学校管理	(214)
第一节 学校管理概述	(214)
第二节 学校管理理论	(219)
第三节 学校管理实践	(224)
第四节 班级管理	(232)
第十一章 教育评价	(239)
第一节 教育评价概说	(239)
第二节 中小学教育评价	(248)
第十二章 教育研究方法	(262)
第一节 教育研究的分类	(262)
第二节 教育研究的设计	(266)
第三节 学校教育中常用的研究方法	(273)
第四节 研究论文的撰写	(283)
第十三章 当代教育理论新进展	(289)
第一节 20 世纪西方教育思潮通览	(289)
第二节 终身教育思潮	(296)
第三节 全民教育与全纳教育思潮	(299)
第四节 国际理解教育思潮	(302)
第五节 STS 教育思潮	(306)
后 记	(312)

第一章 Chapter One

教育与教育学的发展

本章提要:本章探讨了教育的概念、教育的起源,以及教育学的起源、学科性质等诸多问题,着重使学生明确什么是教育;初步了解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概况,懂得树立正确的教育观、掌握教育规律的重要意义。

自教育成为第一大就业行业,没有人否定教育的存在,也没有人断言自己已经掌握了教育的规律。在日新月异、变化万千的今天,教育在促进社会进步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强大,现代生产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是对教育的探求不再是书斋中个别知识分子把玩的学问或专业,而成为每个社会人所必须理解掌握的一门技能技巧。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教师专业化兴起以来,教育学更成为一门显学。

第一节 教育的起源

教育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使得我们对教育有着泛化性的理解。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几乎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经历,作为家长又或多或少有充当“教育者”的机会,似乎任何人都有对教育的发言权,都可以凭借直觉懂得“教育”是怎么回事。但正是由于这种泛化,使对教育下一个规范性定义却变得相对困难起来。课堂上,教师口若悬河地讲授,学生平心静气地聆听是教育;在师傅声色俱厉地教导下,徒弟们诚惶诚恐地反复练习是教育;听广播看电视是教育;偶然读到一本渴望已久的好书也有人会说“深受教育”;甚至“一字之师”人们也谓之“教育”。总之,在日常生活中,一切使人获得知识、提高认识能力的活动,都被人们称之为“教育”。既然教育是如此繁杂的现象,那么教育的定义显然不能以“一言以蔽之”的形式概括了。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人们把教育从众多社会系统、教育现象中剥离出来,专门加以研究,才形成了教育学体系。在此之前,教育学思想散见于当时的政治、哲学、伦理学乃至文学典籍中。

一、教育的概念

“教育”是我们经常使用、非常熟悉的一个概念,但愈是常用,就愈难以进行准确的界

定,可以说是不说还明白、越说越模糊的问题。现在一般认为,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是传递生产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的必要手段。它同社会的发展有着本质的联系,并受教育对象身心发展规律的制约。为研究的方便,我们认为,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说凡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的思想品德的活动,不论是有组织的或无组织的,系统的或偶然的,都是教育。而狭义的教育,则是指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响,把他们培养成为一定社会(或阶级)所需要的人的活动。显而易见,它主要指学校教育。但随着现代社会发展的日趋多样化、复杂化,各类业余学校、短训班、研讨班的兴起,各种社会机构教育活动的增多,教育活动向成人和幼儿两端延伸,使教育学所研究的教育不再局限于学校教育,而是包含了各种校外教育机构和作为终身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在内的所有有组织有目的的教育活动。“教育”这个词,有时还作为思想品德教育的同义语使用。特别是在平常人口语中,说某某缺少“教育”显然是指他缺少教养而言。除了口头上人们没有把教育与教养区分开以外,对教育定义的理解不一致也是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所以有的教科书上干脆说“最狭义的教育,乃指思想品德教育”^①。质言之,教育在人类经历的漫长岁月里,原本无所谓广义与狭义之别,而是随着教育活动的演进,衍生出不同范围与层面的教育,才相应的形成了含义不同的诸多“教育”概念。

二、教育发展的过程

在中国古代,“教”和“育”两字最初并未合成一词,而是各有含义。根据《说文解字》的解释:“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做善也”。“教”是指教化;“育”是指养育。一般认为,“教育”一词最早见于《孟子·尽心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实际上,中国古代文言文多用单音词,《孟子》一文中的“教育”仍然是“教”和“育”,只是在白话文盛行后,人们才多用复音词,教育一词也渐渐流行。

在西方,“教育”一词,英文为 Education,法文为 éducation,德文为 Erziehung,均源于拉丁文 Educare。“E”在拉丁文中意为“出”,“ducare”为“引”,合之则为“引出”,即引导儿童的固有一天性,促进其身心发展。在前苏联的教育学书籍中把教育与教养区分开来,认为教育与教学是并列的概念,对教育的理解显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学校教育。

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也就有了教育。教育是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是人类社会区别于动物界的重要标志。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之所以不同于动物界,就在于它的社会性、目的性。它不是依靠自发的动物本能,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首先是生产关系中的有目的的实践活动。这种实践活动要求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必须具有并不断发展进行多方面活动的的能力。人不像动物那样随着出生就带有一定的成熟的技能技巧,而是必须通过后天的学习才能完成个体发展。相对而言,人类具有更长的哺乳期,这虽然是人类

^① 韩延明、王振中主编:《教育学》,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不成熟的表现,但更为其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人类有着更为漫长的学习期。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与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是相互促进的。人类社会的进步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条件,教育则是推动人类社会由蒙昧状态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动力。人类社会由蒙昧状态进入文明时代,教育也随之由自发形态上升为自觉活动。细言之,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需要经验、知识、技能,需要适用于生产和生活过程的各种智力和体力,都具有社会性和历史继承性。所谓社会性,表现为社会要求对它随时随地地进行交流和传播,使其为更多的人所理解、掌握,从而达到整个社会生产和生活能力的不断提高。历史继承性则表现为每一历史时期所积累的文化成果,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传授给下一代,使前人的成果化作后人新的起点,以保证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的不断发展。因此,为了人类自身的繁衍和发展,人类在共同的社会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必须发生某种程度的交流和传递活动,这便产生了教育。

原始社会尽管生产水平低下,社会生活极其简单,但它同样迫切需要教育来为其服务。例如,怎样制造和使用火、木石等工具,怎样团结起来进行集体的采集和狩猎等生产活动,怎样与洪水猛兽及其他自然界的威胁作斗争,怎样协调集体生活、进行社会事务活动等等。所有这些必然需要教育来相互交流有关的经验、技术、知识,特别是将其传授给后代。原始人群正是在极其艰苦的集体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创造出了人类最初的原始形态的教育。原始的教育活动多是在人们的劳动和生活中进行的,通过生产劳动、社会生活,年长一代向新一代传授了取火、制造工具的知识技巧,传授了原始工艺技能技术,教给他们制造石器、骨器和陶器的本领,并通过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年长一代向新一代传授了群体部落的风俗、礼仪、习惯和道德。考古学发现,生活于四五十万年前的“北京人”在制作石器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方法和程序,石器的类型也开始分化,各有不同的用途,每一件石器都是经过反复思考和辛勤打磨才完成的,所有这些都凝聚了原始人群的智力、体力及多年积累的生产经验和技能。要熟练地制作和使用这些工具,不经过一定的传授和训练,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制作和使用工具不能不同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到了氏族公社时期,经济、文化的发展,使教育活动不可避免地从萌芽状态进入更有意识、有目的的状态,开始和别的社会活动产生一些分化现象。社会不仅出现了农业与畜牧业的分工,而且还出现了脑力与体力的相对分工,特别像轮制陶器和冶金技术那样的工艺技术需要更专门的分工和学习。其时所进行的社会活动,诸如选举、讨论公共事务、部落间的冲突及祭祀和宗教活动等,不仅要求每个公社成员有一定的相关知识,而且更要求“巫师”或类似的人能组织甚至统领这方面的活动。这类人才绝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教育的结果。换言之,人类社会发展到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近似于理性形态的、具有系统性、综合性的知识,它们一经产生,就改变了原始的、自发传授方式,改变了脑力劳动依附于体力劳动的状况。传授这类知识,不能仅仅通过生产和生活实践,运用简单的示范和模仿,而是要有专门的训练,甚至必须要创制专门的传授工具、专门的场所、专门的施教人员。总之,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求教育变为专门的社会实践活动,向更高水平发展。于是,

专门的教育机构——学校开始萌芽。

三、学校教育制度

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及文化水平已经比较发达,知识的积累相当多,私有制和阶级的萌芽已经出现。社会上出现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一部分人不再从事直接的生产劳动,在这些历史条件下,设置一些专门负责教育工作的人员才有可能,即产生了专门的教育机构——学校。据古籍记载,我国早在虞舜时代就有被称为“庠”的类似教育机构。“庠”最初是饲养牛羊的地方,担任饲养工作的是老年人,他们一面饲养管理牲畜,一面教育孩子,所以通常认为原始氏族社会末期出现了萌芽状态的学校。到了夏代,已有专门的施教机构,这在古籍中有所记载。如《孟子》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学记》中记有“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遂)有序,国有学”的教育制度。尽管在学校诞生的考据方面还有许多困难,比如,夏朝的“序”是奴隶主贵族及其子弟练习骑射的地方。据《说文》解释,“序”只有东西两面墙壁,中间是一块空旷的场地,而不是房屋式的建筑物。由此可见,“序”不是讲学的教室,而是习射的场所。夏朝的奴隶主贵族为了巩固和扩大本阶级的统治,一方面需要镇压本部族奴隶的反抗、起义;另一方面又不断征伐、掠夺其他部族。因此他们非常重视军事训练,以便把本阶级的成员及其后代培养成为能骑善射的武士。可见“序”产生于夏朝,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夏朝的“序”把练习骑射作为教育内容,含有武士教育的意义,是一种军事体育性质的教育机构。正如《孟子》一书所说:“序者,射也。”在我国古籍中,有些记载把“序”说成是养老的机构,或认为“序”有大学和小学之分,这是不切合当时的实际的。但我们也不能由此而否定“序”的教育意义,甚至也不能否定它就是学校教育的一种雏形。

西周时代,我国学校教育制度已经发展到比较完备的形式,建立了典型的政教合一的官办学校体系,形成了以礼乐为中心的“六艺”教育。六艺由六门含义甚广的课程组成:礼,以人伦规范为中心,包括政治、历史和典章礼仪等的教育;乐,包括音乐、诗歌、舞蹈等使人感受美、欣赏美等愉悦身心的教育;射,射箭技能技巧以及相应礼节规范的教育;御,以驾驶兵车为主的军事技术教育;书,习字教育;数,数学的读、写、算和记账典簿的教育。到了春秋时期,官学衰微,私学勃兴,儒、墨私学成为当时的显学。这一时期及其后的私学发展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私学突破了“学在官府”的限制,教育对象由贵族扩展到平民,教师自由讲学、学生自由择师,教学内容与社会实践有了更广泛的联系。对当时社会现象、问题及解决方案的不同解释,形成了各种学说和流派。而且各家各派相互争辩,相互汲取和补充,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盛况,亦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轴心时代”。其中孔子私学的规模最大,号称“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但他的“六艺”已不是西周时期的六艺,更多是与《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经相连了。

学校教育之所以在奴隶社会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其一,社会生产生活发展的需要。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增多,使一部分人能专门从事管理生产、掌管国事、从事文化



科学教育活动。即劳动剩余产品增多使社会上出现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这种分工的出现需要一部分人接受专门的教育,于是学校教育机构随之出现。可以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是教育机构产生的重要根基。其二,文字的产生是学校教育产生的另一物质基础。文字的产生是因为记忆负担过重,“结绳记事”的传说人们耳熟能详,但为什么要结绳记事,是因为人类生活中有许多事情需要记下来,人类的进步正是建立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实践中人们发现,刻画比结绳更有利于记忆,于是人们把需要记忆的东西以图画的形式刻画下来,为了刻画的简单,而逐渐形成文字,形成记录和传授知识的新工具。考古发现几乎所有的文字皆起源于象形字。利用文字,既便于知识的积累和记录,又便于知识的传播,它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但掌握文字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进行专门的文字教学,要求有掌握文字从事施教的人员和专门施教场所。因此文字与学校教育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关联。仓颉造字的传说因山东大汶口的陶器图画文字的发现而获得了可以作为历史发展背景的证据。大汶口出土的六个陶文,其中已有很规整的意符文字,如炅(热)字作“𤇀”,上面是日,中间是火,下面是山,像在太阳下,山上起了火。还有这个字的简体作炅,只有日下火。考古学家指出,这种意符文字已经是很进步的文字,可以同两千年后的甲骨文和金文一一对照。可以确信,在距今约四千六百年的黄帝时代,文字在生活中的运用已非罕见,因而由巫史中人加以整理,使文字渐趋规范化,这或许就是仓颉造字传说的由来。当然,如鲁迅所说,其事也“不能归功于一圣”,文字的产生有更复杂的社会动因。其三,在生存的基本需求之上,尚有发展的需求。对特权阶级来说,“劳作”与他们的生活的环境渺不相关,劳动生活是他们漠不关心的,因此,武艺、音乐、文字等专门的知识内容,便分化出来以适应这种需求,并以知识的定向积累来强化这种需求。如军事教育成为教育的基本内容、孝成为道德教育的新内容、强调礼乐之教。教育也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是贵族必备的条件。特别是兵器的产生与战争的频繁是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初期的显著特点。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已经处在向奴隶制国家的过渡时期,氏族与氏族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不断进行兼并。根据战争的规模和兵器生产水平,不仅可以断言对年轻一代进行军事教练已成为那个时代所必需,而且可以推测那个时代军事教练的内容。同理可知,孔子之所以对樊迟问稼问圃感到气愤,是因为他把教育看作是让奴隶主阶级的子弟学习礼仪规范等治人之术的手段,而不是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其四,人类追求精神生活的发展。人类有着追求完美的天性,当人们把陶器变得更好看时,那不仅仅是为了耐用,枯燥的生活同样需要自娱自乐的精神生活来丰富来协调,这是学校诞生的心理基础。

在欧洲的奴隶制社会中,最典型的是斯巴达和雅典两种类型的教育。斯巴达的教育全部由国家组织、管理和控制,以军事为主,学习内容有关赛跑、跳跃、角力、骑马、游泳、掷铁饼、投标枪等军事体操训练,以养成体格强壮、残忍果敢、头脑冷静的奴役奴隶的武士。雅典的教育有所不同,由于雅典的商业比较发达,政治斗争更趋复杂,所以他们的教育内容除了竞技方面的训练外,还有辩证法、文法、修辞三门学科,以便培养有文化教养的商人和能言善辩的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因而雅典的教育除重视体育、军事训练和道德教育之



外,还注意到智育和美育。在西方社会中,雅典是最早形成体育、智育、美育和谐发展的教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活跃于民主政体的雅典。

小资料:

在西方先哲中,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者之间的直接师承关系最为引人注目。柏拉图师从苏格拉底8年,亚里士多德师从柏拉图前后长达20年。实际上三位先贤在具体哲学思想、治国理念上并不完全一致,但他们在教育史上的贡献却都是十分显赫的。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柏拉图对理想的追求以及创办的“阿加德米”(Academy)学园、亚里士多德的“百科全书”式的教育追求,都成为后世教育论著不可或缺的内容。

当然,社会选择学校作为人类文明传递的最重要方式,主要还与学校这种教育形式在传承人类文明上的优越性有关。首先,学校是一种特殊的专业性社会组织。学校这种组织与其他组织不同之处便在于它是专门为施教而组织起来的,是根据特定的目的而创造的一种人为的社会环境,可以按照社会的要求对受教者身心施加影响。其次,有专门的教师。与偶然接受的教育不同,学校教育是在教师的组织下进行的。教师是专门施教的人员,他不仅要精通某方面的知识、具备特定的能力,而且他必须意识到是代表着社会对受教对象进行教育。这样他就从狭隘的个人意识或家族经验中摆脱出来。所以从教人员的专门化是学校产生和发展的突出特征。再次,有固定的时间、对象和施教场所。学校皆是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对学生进行教育。尽管我们承认孔子周游列国途中也进行讲学,如“习礼树下”,但我们不认为那就是学校;尽管我们承认原始形态的教育,如父传子、师带徒的方式在社会生活中仍广泛存在,但我们仍然不认为那就是学校。换言之,学校必须有固定场所、施教人员和施教内容。最后,学校是一种最有效的施教方式。学校这种专门化的组织对于进行教育来说是最有效的,它要选择明确的内容、适当的方法。所以,自从学校诞生,就有了对教育规律的探索,这为教育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当然,此时的学校教育刚刚产生,各种规章制度还不完备,有其自身的特点:其一,教育的等级性。此时的教育是奴隶主阶级独享的特权。原始社会教育的共同性和普适性遭到破坏,学校教育为统治阶级所独占,劳动人民得不到受教育的权利。教育目的也是为培养统治者服务,传播的知识皆为如何对劳动人民进行统治。由于所有文化典籍、祭祀器皿都藏于天子、诸侯的宫廷之中,由专门担任文化事务的官吏世袭保管,他们分别向后人或其他需要的人传授该方面的内容。即后人称之为“学术官守”或“学在官府”。因而教师也不是独立的社会职业,而是担任某一职务的官吏,即“官师合一”。其二,内容脱离生产劳动。既然学校教育是培养统治者服务,而奴隶社会的统治者是不需要参加生产劳动的,再加上,当时文字初创,笔纸尚未发明,只能以刀作笔,用竹简为纸,所有的“典”“籍”“策”“简”“牍”“册”都十分昂贵且复本极少,其他礼乐教育所需器具也归官府所有,这些知识的学习需要人们相当长的时间、相当大的精力,很多情况下的学习都是靠死记硬背,所以教育与劳动相脱离的状况比较突出。



其三,学习时间短且无固定形式。往往是一个教师教几个学生,不分年级,学习内容各不相同,学习时间不固定。孔子设教于“杏坛”,实际上是在树下团坐而已。

秦始皇统一中国仍然沿用了“学在官府、官师合一”的教育制度。官学中只以法令作为学习的唯一内容,禁止私学甚至焚书坑儒,造成文化的倒退尽人皆知。汉代先黄老后兴儒,汉武帝设五经博士,重置太学“以养天下之士”。太学成为教育的最高机构,也成为统治者知识和思想的渊薮。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使得教育与统治的联系更加紧密,对破除门阀等级制度起到积极作用,也使得社会流动更加合理有序。其对选拔人才、稳定统治、普及文化知识的贡献甚伟。但对知识分子的视野窄化、思想局限、人格禁锢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唐代后期兴起至宋代发展到鼎盛的书院则为教育冲破科举制度走出了另一条道路,可惜后来的封建统治容不得这块思想自由的阵地存在,书院的官办色彩日益浓厚。宋代以后,程朱理学成为国学,儒家经典更被简化为《四书》、《五经》,以此作为基本教材和科举考试的依据,知识的发展走向歧途。明代以后八股文被规定为科举考试的一种固定格式,科举对教育的影响不仅是在思想内容方面划定范围,而且在形式上也要遏抑创造性的发挥,学校是科举附庸的现象走到极致。所以,只有科举制度废除,现代学校教育才真正在中国落地生根、茁壮成长。

小资料:科举制

中国封建王朝设科考试用以选拔官吏的制度。始创于隋,形成于唐,延续至清末,存在了1300年。科举制度的产生,适应了当时社会政治发展的需要,打破的门阀士族对官吏体系的垄断,选拔才识卓异之士进入政治管理领域,对维护封建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对同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教育制度以及知识分子的学风,都曾产生重大影响。历代以科举入仕而名垂青史的有:[唐]张九龄、颜真卿、郭子仪等;[宋]寇准、包拯、司马光、王安石、李纲、苏轼、文天祥等;[明]于谦、海瑞、张居正、史可法等;[清]林则徐、翁同和等。然而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弊端也逐步显现。讲关节、重门第、舞弊之法层出不穷,考试内容与方法失当,以至成为教育空疏无用的罪魁祸首。

总之,学校教育是社会发展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的产生使教育从其他社会系统中分离出来,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现象而存在。与实践活动中进行的直接教育相比,学校教育对人类文化传播和社会延续与发展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它日益成为整个人类社会这个有机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第二节 教育学的发展

以教育现象、教育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教育学,是在近代自然科学普遍确立之后才出现的。但是,它的产生和发展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一、教育学的产生与发展

任何一门科学都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教育学的产生也是人类社会,特别是教育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随着近代科技的发展、实证主义思想的勃兴及社会对于教育的需要日益增长的情况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教育这一社会实践经验的不断丰富和积累,不断深化和发展。教育学产生大致经历了两大阶段。

(一)教育学的萌芽阶段

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前,教育学还只是作为一种教育思想、教育经验或教育现象的描述,散见于当时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的一些政治、哲学、伦理学、宗教甚至文学著作中。中国的孔子、墨子、老子、庄子、孟子、荀子、董仲舒、韩愈、王安石、张载、朱熹、王阳明、顾炎武、颜元、黄宗羲、戴震,以及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昆体良等,他们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都以各自的哲学思想为基础,结合不同的认识论、政治观、伦理观和教育实践经验,对教育及相关问题进行总结、探讨并至升华,提出了一系列对后世教育及教育学的发生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观点和主张。如孔子,他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创办了私学,教学活动达五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他的教育思想包含在他的哲学思想之中,并同他的政治思想、伦理思想、文学思想掺杂在一起,我们今天仍在引用的“三人行必有我师”、“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启发式教学”(孔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等等都散见于《论语》中。但《论语》不是专门的教育著作,而是孔子若干语录的汇编,它更像儒家思想史著作。

大约到了战国后期,才在我国教育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论述教育的专门著作,如被郭沫若考证为孟子高足乐正克所著的《学记》,被认为是“教育学的雏形”^①,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论述教育问题的专著。它仅用 1229 个字,从正反两方面系统精辟地概括总结了我国先秦时期的教育教学经验,论述了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教育的作用、目的、任务,教师的地位,师生关系,教学内容及其程序等诸多问题,提出了循序渐进、温故知新、因材施教、循循善诱、不陵节而施、禁于未发、长善救失、藏息相辅、教学相长、尊师重道等一系列教育、教学的主张和原则,至今读来仍不乏启迪。其次是《大学》。《大学》也是《礼记》中的一篇,成文于战国末年,全文共 1743 字,是儒家有关大学教育的集中反映。由于儒家教育主要是道德教育,因而本书可以被认为是儒家道德教育的专著,宋代朱熹把它列为四书之一也正因此。本书明确提出了道德教育的完整体系,包括所谓三纲领和八条目。三纲领是“明明德”、“亲民”和“止于致善”。八条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三纲领。很显然,其中前五条为修己,后三条为治人。修己的目的是为治人,治人又必须以修己为前提。无论是修己还是治人,“皆以修身为本”。八个步骤前后相续,对我国封建时代士人为学、做人、从政影响极大。

^① 毛礼锐主编:《中国教育史简编》,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47 页。



在西方,罗马的昆体良(35~114)被认为是教育史上第一个教学理论家,他曾写过《雄辩术原理》一书,对教学工作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如他强调必须让孩子进入学校学习而不是以家庭延请教师的方式,通过转换学习内容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通过分班教授的方式可以使每个孩子都取得进步,家庭生活儿童早期教育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教师应当是学问的楷模而不是体罚的执行人,等等。至今仍然有借鉴意义。

当然,中外古代思想家、教育家的教育思想,仍然只是他们哲学思想或政治思想的一部分,其中的论述虽不乏真知灼见,但在更多问题的分析说明上,由于时代的局限,往往还停留在感性认识或简单的形式推理上,简洁、直观、朴素是其共同特征。他们这种对教育实践经验的描述还未形成系统的教育学理论。

(二) 教育学形成阶段

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迅速提高,科学研究也飞速进步,特别是机器工业的发展需要有文化科学知识的劳动者,促使教育日益扩张。正是随着教育的扩展,教育学在教育实践中和学科分化中从哲学和其他学科中分离出来,逐渐成长为一门相对独立、内容丰富、体系完整的学科。

历史上第一次把教育学作为单独一门学科提出的是英国的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培根(1561~1626)。他在《论科学的价值与发展》一文中,把教育学理解为“指导阅读”的科学。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1592~1670)在继承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想,吸收16~17世纪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和唯物主义思想,概括前人和自己的教育经验基础上,发表了《大教学论》(成书于1632年)。在这部著作中,夸美纽斯提出了诸如普及教育、学校教育的目的和作用、班级授课制、直观教学等一系列教育措施和整套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奠定了近代教学理论的基础。尤其是他的“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的教育主张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前苏联及东欧各国普遍把这部书作为西方近代教育学的雏形,是教育学从哲学著作中分化出来的标志。

其后又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教育思想家,如英国哲学家和教育家约翰·洛克(1632~1704)。他在《教育漫话》(1693)提出了著名的绅士教育思想体系,对当时英国上层社会子弟的教育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所阐发的反对天赋观念的白板论更是为人们所熟知。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1712~1778)的长篇巨著《爱弥儿——论教育》(1762)也是教育经典之一。其中尖锐地批判了腐朽的封建灌输式教育,提出了追求个性解放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瑞士教育实践活动家和教育理论家裴斯塔洛齐(1746~1827)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出发,不仅发表了教育名篇《林哈德和葛笃德》,而且通过自己的终生教育实践,身体力行了自己的教育主张,在当时就蜚声世界。

一门学科的建立与否,其重要标志之一是在大学里是否开设此门功课。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大学里讲授起始于德国哲学家康德,他于1776年在哥尼斯堡大学第一次开设教育学讲座,但先后进行四学期(1776~1787)就改弦易辙了。继康德之后的是赫尔巴特



(1776~1841),他不仅继承了康德的哲学和教育学讲座,而且第一个进行了教育学科学化的努力。他先后出版了《普通教育学》(1806)、《关于心理学应用于教育学的几封信》(1831)、《教育学讲授纲要》(1835)等著作,努力从伦理学和心理学两方面对教育学进行科学的构建。他以伦理学为基础建立了教育目的论,以心理学为根基建立了教育方法论,并创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课程体系,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育学理论体系。他还根据“统觉”学说,强调教学应该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提出形式教学阶段理论,将教学过程分为明了、联想、系统和方法四个阶段。赫尔巴特的学生齐勒尔和赖茵又发展为五个阶段,即预备、提示、联想、总结和应用。后来,凯洛夫又将其演变为五步法,即复习、引入、讲解、总结和练习。20世纪50年代,我国中小学曾广泛采用这一教学模式。赫尔巴特本人被称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传统教育学的创始者和“科学”教育学的奠基人。从夸美纽斯到赫尔巴特,标志着独立形态的教育学初步形成。

(三)教育学理论的发展

随着生产、科学、文化的迅猛发展,教育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学校教育逐渐普及,人们对教育理论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教育学理论也日趋繁盛,如德国教育家福禄倍尔(1782~1852)不仅发表了《人的教育》(1825),而且第一个创办了幼儿社会教育的重要机构——幼儿园(Kindergarten),其对儿童的早期教育思想开创了教育理论研究的新领域——幼儿教育。几乎同时,1835年出版了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教育家第斯多惠(1790~1866)主编的《德国教师教育指南》,对德国教师的思想和专业指导产生了巨大作用,也在教学理论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开创了俄国民族主义教育理论研究的先河,特别是他在《人是教育的对象》这篇教育名著中系统阐述了他的教育观点,其在强调教育普遍规律的同时,也竭力探讨了教育的民族性。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斯宾塞(1820~1903)在其《教育论》中阐发了他的社会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提出真正的教育应该放在实际需要的基础上,使教育为人的完满生活作准备。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各国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由工业革命及其引发的经济和政治等各方面的变化,形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各国的社会改革浪潮,促成各种社会思潮的勃兴。就教育而言,工业革命之后,普及教育成为发展生产的必要条件。教育不再是某些少数人的专利,成为了社会生活重要组成部分,而教育的普及又使得人们对教育实践更加重视,对教育问题更加深刻反思,特别是由传统的以教师传授书本知识为主的教育方式所培养出来的人并不能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要进行教育改革,首先需要有新的教育理论。而社会上普遍的民主要求、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高涨、进化论思想的传播、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实验心理学的发展都为教育学理论的研究提供了背景、问题和基础。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欧美各国兴起了教育革新浪潮,注重教育的普及,注重教育规律的探索,注重使平民所受教育与手工和工业劳动联系起来的倾向日益明朗。于是,西欧出现了一种为社会培养新型上层人物的学校——“新学校”,以培养具有